

贫困山区冲破 “贫困恶性循环”的思路

——湘西凤凰县经济发展的启示

罗先成

象幽灵一样长期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贫困恶性循环”，在我国的贫困山区远未从根本上摆脱，且有加大的趋势。本文试图以凤凰县经济发展的实践，借鉴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贫困山区如何冲破“贫困恶性循环”，以促进经济发展作一初步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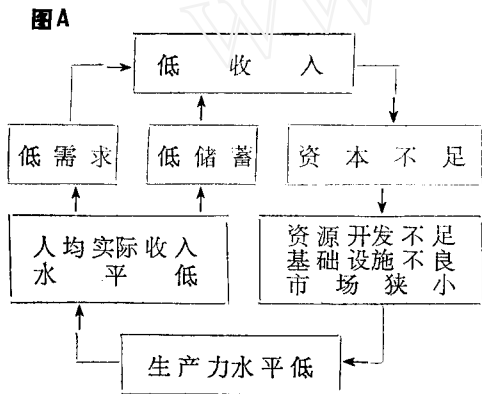
凤凰县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部，是一个面积仅1758平方公里，人口32万、12个民族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县。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是湖南省乃至全国有名的贫困县。1980年以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带动下，以新的姿态和面貌，冲破了“贫困恶性循环”，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分别由1980年的6512万元，207万元增至1990年的2.97亿元，1.064亿元；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人均财政收入跃居湖南省之首。

凤凰县是怎样冲破“贫困恶性循环”的？至今仍处于贫困之中的我国广大山区，应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纳克斯于1953年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贫困，并不是由于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其中主要是“贫困恶性循环”。其主要内容为两个循环：一是反映供给方面资本形成的恶性循环，即“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低收入的人们不能不将大

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而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小；低储蓄水平引起资本稀缺，从而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引起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的恶性循环”；一是反映需求方面资本形成的恶性循环，即：“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低收入意味着低消费和低购买力，低购买力造成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水平。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与纳克斯这一理论基本相似的有纳尔逊(R·R·Nelson 1956年提出的“低水平陷阱”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Mrdal)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在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变化态势；即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变变化，产生次级变化，强化先前的因素，使经济发展过程沿着原先因素的发展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以及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卫生健康状况恶化，教育文化落后，从而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发生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又使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下又引起产出增长停滞甚至下

降,最后,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低收入又进一步使经济贫困化。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性循环而不能自拔。①尽管纳克斯、纳尔逊、缪尔达尔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资本形成理论或多或少带有某些片面性,没有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困、落后的真正根源。但他们所描述的5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这些状况,在我国很多山区至今还严重存在着。就凤凰县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表现得尤为严峻;“生产靠贷款,吃饭靠返销,困难靠救济,财政靠补贴”,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由于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储蓄(积累)也很低,人们除了满足现期低水平的消费,几乎没有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由低收入水平所决定的购买力自然也很低,从而社会需求也就十分有限。这样,全县处于低需求、低投入、低生产率、低产出的低水平的经济均衡陷阱与社会贫困的恶性循环(如图A所示)。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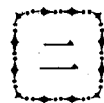
(一) 资金短缺。1980年,全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23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元,人均财政收入7.2元,分别比湖南省平均水平低51%, 70%和37%。1983年前,全县经济指标在全省县级单位中居倒数一至二位。年均靠国家财政补贴410万元,吃国家返销粮471.5公斤。县级经济只能在“低收入—低积累—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运行。

(二) 劳动者素质低,人才奇缺。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交通闭塞,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党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很难落实,所需各种人才难以调进,已调进和自己培养的人才难以留住。据1984年统计,全县拥有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284人,其中工程师一级才21人。1983年前,全县

文盲、科盲率达44%,农村中连一项农业基本技术都不懂的占41%,甚至在苗区中相当一部分村民至今还不会讲汉语。出现愚昧与贫困同时并存的局面。科技、教育落后制约着经济发展,经济落后又反过来制约科技、教育的进步,形成了科技、教育落后,经济落后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三) 区域闭塞,公共基础设施差。凤凰县位于云贵高原之尾部第二阶梯向江南丘陵第三阶梯与沅麻盆地的过渡地带,境内重山叠岭,岗峦密布,高山低谷,溪河纵横,地形复杂多样。道路既高且陡,既奇又险。行人“对面讲话听得见,走路却要大半天。”这种地理环境严重影响了交通、邮电、通讯业的发展。由于区域闭塞,交通不便,使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基础设施极差。就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而言,至今仍无法抗拒自然灾害的侵扰。1958年至1989年的32年中,就有27年出现干旱,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和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

(四) “山沟意识”浓厚,市场经济意识薄弱。封闭的地理环境,必然使长期在其间生活的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坐井观天,安于现状,满足于吃饱穿暖,自给自足。价值观念,竞争观念、风险观念等现代经济观念十分淡薄。不懂得甚至鄙视市场经济交换行为,认为无商不奸。尽管长期以来,国家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救济贫困户,由于很多救济往往仅限于“输血型”的生活消费,忽视“造血型”的生产消费。不仅起不到发展经济的作用,相反却助长了“等”、“靠”、“要”的思想。形成国家无偿救济越多,人们的进取心越差。这种两眼向上看,两手向上伸,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排他性的习性和心理养成了人们的“山沟意识”。这种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由自然的主人沦为自然的奴隶。这是县域经济陷入恶性运行的因素之一。



长期深受“贫困恶性循环”困扰的凤凰人,深刻感到,要摆脱贫困,启动民族经济发展,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从凤凰的县情出发,采行适合于凤凰资源情况的对策和措施,制定发展战略,其中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选准主导产业,启动县域经济发展。

主导产业或“先导部门”理论,是由发展经济

学家罗斯托 (W·W·Rostow) 于1960年提出的。意指其本身具有较高的产出率,能大幅度积累资金同时又能带动其它产业发展的,在国民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先进的带头产业。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若能准确地选好主导产业,就能充分用好有限的资金,启动经济跳出贫困陷阱,逐步发展起来。否则经济难以发展。凤凰县的决策者们对此有深刻的体会:70年代,在执行上级“办成工业县”的指示下,不顾凤凰的实际情况,先后花了5年时间和大量的人、财、物力办起了一个小氮肥厂,犹以此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但由于缺煤、缺电、缺技术。投产5年,亏损360万元,年均亏损70多万元。导致县财政资金匮乏,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使凤凰一直无法摆脱贫困状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们发现,适合作为启动全县经济发展主导产业的,应是在凤凰有400多年种植历史的,全国40大名烟之一的传统优势产品“晒红烟”为主要原料的高税利产业——卷烟业。于是他们于80年代初,果断地关停了亏损严重的氮肥厂,而由县财政拿出13万元,在一个屠宰场里办起了凤凰雪茄烟厂。这一大胆决策,虽经10多年风风雨雨的艰难历程,然实施结果,却从根本上扭转了凤凰经济的运行格局,使它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一,大大增强了全县的经济实力。全县的社会总产值1949年仅2274.6万元,1980年也只达8258万元,30年只增长3倍多;而1989年就达2.8075亿元。改革10年,经济增长了4倍。县财政从长期向国家伸手到开始对国家有了贡献。据统计,1952至1982年,凤凰县共吃国家财政补贴6380万元,而1983年开始向国家上缴至1989年止,累计上缴国家财政7000多万元,结束了凤凰长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的历史。

第二,为农民脱贫致富,找到了一条新路子。荫着卷烟业生产和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全县的烟叶种植面积也由1980年的9000多亩,发展到1990年的11万亩,产量达11200吨,收入3770万元,户均收入620元,占农户年收入的31%。自1985年以来,靠种烟解决温饱的有4.6万户,18.86万人;脱贫户2.2万户,11.2万人;致富户1.1万户,4.5万人。

第三,烟厂的发展壮大,还带动了与其相关的其它产业的诞生和发展。1990年,经国家统计局和《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企业评价中心共同评定,凤凰雪茄烟厂已跻身全国500家最大企业的第176

位,湖南省100家最大企业的第22位。在1990年实现的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原烟、卷烟产值占66%。而且还带动了印刷、纸张、纸箱、铅、包装、工艺美术等企业的诞生和发展;用烟厂积累的资金、扶持和兴办了铅锌、毛纺、棉织、食品、肉食、服装、拉丝、水银等10多个厂矿企业的发展。其中多数已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而使凤凰从1984年起每年能保证有1000万元以上的资金用于发展农业,1000万元用于发展工业,1000万元用于发展科学和教育。这在全省的各县中是极少的。并加强了对电力、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这些产业的改善和发展。1985年至1990年,县财政共安排400多万元兴建小水电和乡村公路,增加装机容量5925千瓦,总投资4000多万元新建和改善了乡村公路达100多公里;自筹200多万元改造邮电通讯,并在湘西自治州8县市中率先开通长途直拨程控电话。

(二)利用科技兴县,把科技、教育长入经济,走出了一条“以智致富,以富养教”新路子。

其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增加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1984年至1990年,全县用于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资金达5000多万元,是前33年教育经费总和的2.5倍,占7年财政总支出的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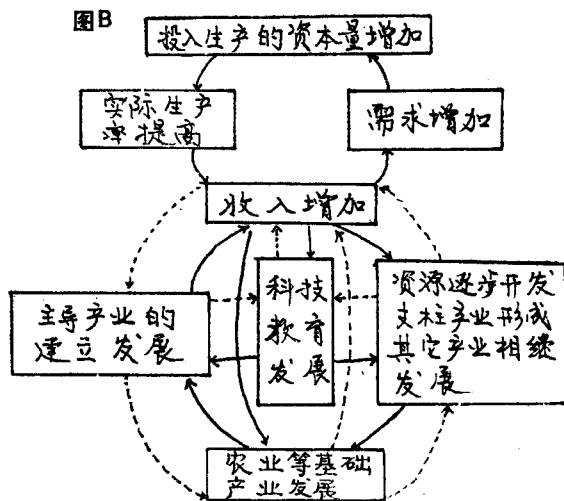
第二,广泛开展科技兴农、兴工活动。在科技兴农方面,狠抓了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示范、注重典型引路。自1981年以来,全县普遍开展每乡建立一个科技示范村、十个科技示范户活动,并组织了400多名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线搞技术推广、技术承包。至1990年,全县推广杂交水稻20万亩,杂交玉米4万亩,“双杂”占播种面积的95%以上,推广优质烟1万亩,仅此一项就增收600多万元。在科技兴工方面,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活动,如烟叶系列产品的开发,畜牧系列产品深加工综合技术的开发,石煤综合利用技术开发等。“七五”期间实施的9项“星火计划”项目,进度完成率100%,投入经费1200万元,累计创产值1.3043亿元,利税5441万元,外汇220万美元,投入产出比为1:10.8。其次,注重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将企业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发展轨道转变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1983年以来,县里先后拨款3800多万元用于雪茄烟厂及20多

家小型厂矿企业的科技研究,技术改造,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其中,烟厂和肉联厂到目前为止,已进行两次技术改造,前者改造完成后,将形成30万大箱的生产能力,可实现利税3亿元;后者现已成为全洲同行业中最大的企业。

第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振兴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凤凰县针对本县教育事业落后,劳动者素质低的现状,克服短期行为,从长计议,不惜血本地增加教育投资,发展教育事业。1987至1990年8月,共投资1300万元,在每个乡镇建了一所具有现代设备的中心小学,并全面改造了中学校舍,建筑面积达6.5万平方米。更值得一提的是,为适应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大胆地改革了教育体制:在教育结构上,在抓好普通教育的基础上,着重发展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至1990年已创建职业技术学校32所,教师进修学校和电视大学各一所。为凤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在办学形式上,坚持多渠道办学与多层次办学相结合,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劳动者素质,在教育内容上,坚持提高文化技术素质与服务生产相结合,注意时效性,加强针对性,讲究适用性;如在苗区提倡用苗语来扫盲和普及科学知识,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以学简单实用技术为主,在县城或比较发达地区,以工、商、建、运、服的业务培训为主。并在培训中注意根据不同季节和市场化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坚持将科学技术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文盲率由47.7%降到17.7%;6.3万户农户中已有6万户,10万人接受了短期培训,每户有1个掌握了1至2门农业实用技术,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三)实行全方位开放,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凤凰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为什么长期以来,经济总是发展不起来?除了其它原因外,与其封闭的地理位置,封闭的经济格局,封闭的生活消费和物质循环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封闭的思想观念有关。封闭导致了落后,落后加剧了封闭,形成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就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状态,参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首先,加强同湘、鄂、川、黔四省边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大

力开拓边区贸易市场,积极参与四省边区县、市的经济协作会和资金协作会,交通运输管理协作会及科学、文化、技术交流活动等,有效地促进了边区之间的物质、资金、技术、信息、文化、交通运输的合作。先后与边区县、市的200多家工商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仅1987年一年就购销烟叶、粮食、畜牧等农村产品总金额达2000多万元。其次是加强与全国发达地区和国外的经济合作。自1983年以来,已与全国18个省市及四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协作和贸易往来。先后从上海等地聘请了60多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等技术人员来本县当企业厂长、顾问,并与外地实施40多个协作项目,引进价值320万元的先进机器设备。通过技术革新,新增了30多个工业品种,且有10多个新品种打入了国际市场。“七五”期间,凤凰县依靠经济技术协作,引进先进技术而增加的产值累计达2.089亿元,创利税960万元。1990年市场全面疲软的大气候下,凤凰县工业产品的销售收入仍有较大的增长,达2.86亿元,比1989年增长43%。更为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冲击了凤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打破了小生产者自私、保守、狭隘、封闭的精神枷锁,增强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等,这些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凤凰县由“贫困的恶性循环”转入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如图B所示)。



注:(1)实线代表正方向作用。(2)虚线代表逆方向作用。(3)此图没有画进对外经济关系。

总之,经过4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十年的艰苦探索与奋斗,一改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跨入全国富裕县的行列,成为远近闻名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率先达亿元的县份之一和湖南省5个亿元县(市)之一。



凤凰县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人们的关注。它对于至今仍处在贫困中的广大山区具有典型的意义。

(一)充分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建立主导产业。这是冲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启动器。冲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是如何起步。在资金短缺、人才奇缺、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凤凰从易于开发的优势资源——晒红烟出发,以烟草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起步产业,由此带动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广大山区大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只是有的在这方面占优势,有的在那方面占优势。在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应首先从本地易于开发的优势资源出发,选准经济发展的起步产业。在建立起步产业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三原则:一是择易原则。即尽量避免自己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劣势,选择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择利原则。即能占据较大的销售市场,并能大幅度地盈利,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三是择众原则。即能使本地区全体劳动者成为商品生产的主体。当主导产业有一定发展时,就象凤凰那样,及时利用其提供的资金积累和其它来源的资金兴办一批能提供大量的稳定收入来源的支柱产业,使整个经济以更快的步伐冲出“贫困陷阱”,成长到新的阶段。

(二)正确处理工农关系,重视各产业协调发展。这是长久冲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十分重要的基础部门,其发展的速度或水平,对于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我国山区,农业基础大都比较脆弱,粮食长期短缺。但有些地方由于求富心切,忽视农业甚至用牺牲农业的办法去谋求工业的发展。其结果,由于基础不牢,富了又返贫。而凤凰县走的是一条立足于本地农业资源,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农业生产什么,工业就加工什么,使农业和工业融为一体。如前所述的烟草业,肉食水产业等支柱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如此。贫困山区要长久地冲出贫困圈,就必须把农业

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开拓农村市场,全面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加强农田的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等等,使农业与工业有机地融为一体,竞相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大对交通、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的投入,努力发展第三产业。

(三)充分发挥科技、教育的乘数作用。这是冲破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手段。所谓科技,教育的乘数作用是指,科技、教育长入经济的程度同收入变动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函数关系。即科教长入经济速度增加或减少引起收入成倍地增加或减少,经济发展速度成倍地加快或减慢。世界各国和凤凰经济的发展都证明了科技、教育的这一乘数作用。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80%是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取得的。如前所述,凤凰县1990年,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所增的产值占增长总额的60%,这一年实施的9项“星火计划”投入产出比为1:10.8。这说明,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结合是贫困山区在较短的时间内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

贫困山区在利用科技、教育振兴经济时,应引起两个方面的注意。一是在科技方面,在经济起步阶段,应以研究和推广适宜技术为主,不要盲目追求“高、尖、新”。所谓适宜技术,即不是资本密集,而是劳动密集的技术,但又不是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时,劳动力应具有较高的素质,同时配备有适当的装备,是有效地使用劳动同时又有效地节约资本的技术。应优先选择那些适合本地特点,技术简单可靠,投资少,易于发挥本地优势且经济效果显著的“短、平、快”项目。而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再逐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二是在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既要注重提高一般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素质,更要加强对山区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②凤凰县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干部的领导才能和政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凤凰县的领导班子换了几届。但往往是短期班子,长期行为。全县很多改革政策的出台都具有创新精神:于1985年早全国一年放开了牲猪价格;1988年(下转第14页)

的所有者支付利息、股息和租金以外，其余的将以劳动报酬、经营性收入和风险性收入留归自己。如果一个人既是直接生产者又是生产经营者，同时还是资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那末，他的全部收入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均为他的个人所得，即他既可获得劳动报酬、经营性收入、风险性收入，同时，也能获得利息、股息和租金。

多年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分配领域，存在着一条客观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肯定按劳分配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的话，那末，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分配领域，与按劳分配规律并存的还有多种客观经济规律：由于存在按经济效益的高低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客观必然性，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条按效益分配的经济规律；由于存在着按资金、生产资料投入的多少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客观必然性，就不可避

免地存在按资分配的经济规律，等等。当然，由于在多种分配方式中，按劳分配是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分配方式，故按劳分配规律是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分配领域，决不是只有一条按劳分配规律，而是存在着按劳分配规律为主导，包括按效益分配规律、按资分配规律等在内共同组成的一个经济规律体系。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⑩⑪⑫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11、11、11、10、11、11—12、11、11、1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7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

（上接第82页）早于全国4年放开了粮食价格等。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全县人民的积极性，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在促进山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创建双级发展极。这是贫困山区冲破“贫困恶性循环”在地域上的生长点。所谓双级发展极是指，在条件比较优越的大中城市或经济特区建立一级发展极，通过它们带动全国或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市镇或县域建另一级发展极，通过它带动全市或全县的经济发展。如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武陵山区，可选择怀化、吉首和大庸为发展极，进行相对的集中投入，形成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群，使他们成为培养武陵山区经济开发和发展机能的现代经济体系，对武陵山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更新起带头作用；而在仍比较落后的县，则以县城为基地创建另一级发展极。双级发展极在本质和作用上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二者的规模程度和能量的辐射范围存在大小之分。凤凰经济

发展再次表明，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不可能齐头并进，不平衡状态是经济在空间上择优发展的必然表现。创建发展极，可以通过它的集聚效应和经济能量的扩散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建立双级发展极则更能发挥各种优势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冲破“贫困恶性循环”。但我国的很多山区，目前的发展极普遍发育不良。这主要表现为，发展极的聚集程度还不高，缺乏大批主导行业和明星企业的集聚；发展极所在的城镇多数还只是政治中心，社会经济功能还不够强，难以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应当引起重视和解决。

注释：

①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14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